

世界现代史

下册（二）

一九七九年一月

第五章 苏修徒叛集团的反革命政变和毛主席发动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执行反动的内外政策，一步一步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到六十年代，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使苏联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苏修的倒行逆施是违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这就使他们必然陷入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从根本上说来，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篡党夺权，不过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垂死挣扎。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联的和平演变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给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当现代修正主义逆流猖獗袭来的时刻，毛主席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横扫了修正主义迷雾，使马列主义的真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发展，把世界历史推向伟大的新时期。

第一节 赫鲁晓夫集团的反革命政变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党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赫鲁晓夫一伙混进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斯大林逝世后，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发动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尼·谢·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党内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他出生在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农民家里，一九〇九年随父亲到尤索夫卡（现名顿涅茨克），曾在这个矿区做工。十月革命后，他投机革命，一九一八年混入党内。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苏共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中，他善于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伪装比谁都革命，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从一个莫斯科工学院的学生一跃而为学院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委员。这期间，他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肃反政策，并声嘶力歇地叫嚷要把机会主义集团“从地面上消灭掉”，“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甚至“焚尸扬灰”，“连一点痕迹也留不下来”。他竭力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内推行肃反扩大化，采取把别人搞臭搞掉的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同时，他寻找一切机会，狂热地口是心非地颂扬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自己生身的父亲”；并一再发誓“我一步也不离开……伟大斯大林所实行的路线”。他用这

一套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欺骗党和人民，到一九三九年已窃居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等要职。

但是，赫鲁晓夫的伪装也常露马脚。他爬上领导岗位后，他的修正主义面目就已有所暴露，并受到过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多次批评。如一九四六年七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评赫鲁晓夫为首的乌克兰中央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七年二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评乌克兰农业管理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和巨大的缺点”。会后，斯大林派卡岗诺维奇接替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九四九年他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后，又大肆推行所谓“农业城镇”计划，拆毁一切旧有的集体农庄建筑和庄员住宅，给广大农民带来严重灾难，也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却狡猾地玩弄两面派手法，把错误推给他的下级或作假检讨，得以蒙混过关，继续隐藏下来，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赫鲁晓夫后来供认，在斯大林病危和为斯大林守灵时，他就考虑如何篡权了。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第一步，就是抓党权。当时，马林科夫既是部长会议主席，又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的第一名成员，而且还是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于是，赫鲁晓夫以“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双重职权”为“理由”，采取分裂党中央主席团的卑劣手法，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九天，即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逼迫马林科夫辞去了书记处书记的职务，重新选举了由赫鲁晓夫等五人组成的书记处。这样，在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只剩下赫鲁晓夫一个人既是主席团委员，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既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主席团中拥有一份权力，又窃取了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书记处的权

力。这就为他进一步玩弄阴谋，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创造了条件。不久，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他又操纵选举，给自己封了“第一书记”的头衔（在此以前，苏共中央没有这一名称），实现了他篡党夺权的第一步。一九五五年二月，赫鲁晓夫以应对农业落后“负有责任”的罪名，又逼迫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从此，部长会议的大权，实际上已经被赫鲁晓夫所掌握。

随后，赫鲁晓夫利用职权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布尔什维克打下去，把自己的亲信和拥护者突击提拔起来。他先后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摩凌斯克、列宁格勒和图拉等共和国和州的党委书记。一九五四年二月，又撤换了哈萨克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把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塞了进去。同时，普遍清洗了党的基层。据统计，当时乌克兰共有九千个党组织书记、格鲁吉亚有二千五百个党组织书记被撤换，就连集体农庄主席，也有百分之六十三以上被撤换掉。通过层层清洗，赫鲁晓夫一伙逐渐控制了苏联各级党政机构，为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地篡党夺权打下基础。

经过一系列阴谋活动和周密策划，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他全面篡党夺权和公开背叛马列主义、抛出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会。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首先是从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把“刀子”开始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不顾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激烈反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一个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黑报告捏造大量谎言，使用煽动性语句，攻

击和诬蔑斯大林，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描绘得漆黑一团，阴森可怖，极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能事。他的党羽也鼓噪而上，一面颠倒黑白，全盘否定斯大林；一面歪曲历史，无耻地吹捧赫鲁晓夫是什么“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是“红军的缔造者”，是“斯大林格勒的灵魂”。赫鲁晓夫一伙在二十大的丑恶表演，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其反动目的就在于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斯大林始终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为之终生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扫清道路。

在赫鲁晓夫一伙的控制下，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将十九大选出的41.5%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排挤出去，勃列日涅夫被提为中央主席团后补委员。这就为他们进一步篡党夺权，作了组织准备。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倒行逆施，遭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大多数委员的强烈反对，党内斗争日益激化起来。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特别会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严厉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内外政策，决定撤销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时，赫鲁晓夫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劣势地位。但是，这个惯于搞阴谋的家伙大施诡计，负隅顽抗。他一面唆使在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等十八名中央委员冲击主席团会议室，无理取闹，拖延时间；同时又通过国防部长朱可夫调动军用飞机，把在外地的中央委员连夜接到莫斯科，采取威胁手段，强行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所谓《关于揭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指责他们“正当党在实现二十大的决议时出来反对党

的路线”，把主席团多数成员打成“反党集团”，并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开除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三月，赫鲁晓夫干脆抛掉“集体领导”的幌子，解除了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布尔加宁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而由他自己兼任，从而集苏联党政大权于一身。一九六〇年，又解除了伏罗希洛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来接替。至此，苏修叛徒集团完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最后地完成了反革命政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赫鲁晓夫一伙在篡夺苏联党政大权的同时，还疯狂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赫鲁晓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歪曲时代的阶级内容，篡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理论，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抛出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

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也就是“议会道路”。赫鲁晓夫胡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从那时起“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他看来，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就等于取得了政权，就等于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这实质上是公开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否认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胡说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是共产党人“政策的总原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

“和平竞赛”是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的又一修正主义谬论。他胡说什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竞赛”。认为社会主义在与帝国主义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只要苏联在生产和生活上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会自行灭亡，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到那时，就连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这里，赫鲁晓夫一笔勾销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任务，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耐心等待苏修和美帝“和平竞赛”就可以了，用不着进行夺取政权，争取解放，这是对革命人民的最大欺骗。

由于赫鲁晓夫把持了会议，“三和”路线被二十大通过，取代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然而，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五年之后，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并将“三和”“两全”以苏共纲领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苏修叛徒集团一切反革命活动的总依据。

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新纲领》，是一个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纲领前一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言论的集中与汇总，除了对“三和”进一步系统化外，又增添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谓“新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消失了，阶级不见了，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了。因而，党和国家都可以是“全民”的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极粗暴的修正。这样，“从三和”到“两全”形成了一条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纲领的最后部分是一个所谓建设共产主义的规划。在这里，赫鲁晓夫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虚伪口号，加上“和平、劳动、幸福”等几个抽象的名词，冒充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不是为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是为了“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可见《苏共新纲领》根本不是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而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黑标本。

赫鲁晓夫把“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当作新创造，到处兜售。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创造，不过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白劳德那里捡来的破烂货而已。白劳德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了新的正统了”。可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是老修正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列宁曾经指

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結果。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经过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到三十年代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尚有七百多万人，其中一些死硬分子不甘心失败，总是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采取种种隐蔽的手段，从事暗害和破坏活动，盗窃、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动摇公有制。特别是当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进攻时，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公开投敌，妄图借希特勒的力量来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非常严重，一九三九年全苏有二百六十五万多公顷土地被私人侵占为宅旁地；有些人的宅旁地甚至竟达一点五或二公顷，并且出现了出租和买卖土地的现象。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腐蚀，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国家机关职员中，特别是在党政干部中，还产生了脱离人民，腐化堕落的蜕化变质分子。这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竭力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利益，时刻企图复辟。事实说明，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仍然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激烈斗争的时期。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核心手中，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54页

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战胜敌人的进攻，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但是，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也是当时唯一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也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离开了辩证法“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①②实际上“它又稳固又不稳固。”②因为，尽管斯大林同一个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他们的复辟阴谋未能得逞。但是，由于党内生活不正常，在清党和肃反斗争中，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诬害了许多党员、干部和善良的公民，包括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高级干部。这就离开和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亦即削弱和损害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种错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当时虽有察觉，并纠正了一个部分错误，恢复了一些人的党籍，释放了某些被捕者，但是，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没有对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这样，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冤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义愤情绪没有得到平息和消除；其二，在清党和肃反中进行破坏和捣乱的党内个别野心家如赫鲁晓夫之流，没能被揭发出来。这就留下了隐患。不仅使这些野心家得以隐藏下来，而且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使得这些制造冤案的罪魁，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却又能借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利用一些人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大反斯大林，大肆攻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篡党夺权，把新老资产阶级的“复辟希

①②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卷第356页。

望”变成“复辟行动”。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但它决不能阻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革命人民会汲取这一沉痛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更加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历史不断推向前进。

赫鲁晓夫的反动内外政策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①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代表，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篡夺政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行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矛头，首先集中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瓦解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上。他们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恶毒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绞肉机”，说它“穷凶恶极地违反了苏维埃法律”，并在“清除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清洗“追求名利分子”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下，对内务部，法院、监狱和军事机关进行所谓“改组”，撤换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老一代老干部老布尔什维克，安插亲信，攫取这些无产阶级专政要害部门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打起“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旗号，胡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职能交给“人民志愿纠察队”、“同志审判会”和“社会监督”等群众团体。赫鲁晓

^① 转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次讲话。

夫还以斯大林时期制定的“刑法”已经“过时”，大搞所谓“司法改革”，取消了“劳动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刑等等。根据新修改的法典，苏修叛徒集团释放了斯大林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押的大多数的罪犯，特别是政治犯，使反革命势力到处猖獗，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在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还拼命强化法西斯专政机关，建立特务组织，对坚持革命立场，反抗修正主义统治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地镇压。一九五四年三月建立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掌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臭名昭著的“克格勃”。这一特务间谍组织，拥有近五十万“工作人员”，除了从世界各地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外，还对苏联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严密的监视，成为赫鲁晓夫推行法西斯专政的重要工具。经过苏修叛徒集团改组过的内务部，是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另一得力工具，它掌握着分布全国的警察。苏修的警察机构，装备了最新式的侦察审讯器材，现代化的监视装置和各式各样的电讯联络设备，用来对付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〇年苏修的官吏、警察、特务的人数已达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人，常备军三百六十二万人。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还以“加强法制和秩序”为名，接连不断地炮制一系列法令、条例，为其推行法西斯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些法令的一个突出点，就是疯狂镇压所谓“政治犯”。一九五八年公布的《刑事立法纲要》和《国事罪刑事责任法》，一九五九年颁布的《关于劳动人民参加保卫国家社会秩序》，规定要严惩所谓“反苏煽动”，“群众骚乱”和“破坏秩序”的人，为打击和镇压“政治犯”

制造了“根据”。凡对苏修统治表示不满和反抗的人，动辄扣上“国事犯”的大帽子，任意判刑和屠杀，他们还以所谓“精神病患者”，“犯罪嫌疑人”为名，对革命人民肆意逮捕和关押。这就使苏联人民完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甚至连反对帝国主义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五年美帝悍然发动对多米尼加的武装侵略，莫斯科一些青年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苏修当局立即出动骑警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示威者。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还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疯狂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给非俄罗斯民族以任何权利和自由。他们采取歧视，迁徙，分化，监禁等种种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赫鲁晓夫的所做所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①

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苏联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仍归国家所有。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国家所有制在不同社会形态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为哪个阶级所掌握，国家运用生产资料为哪个阶级服务。在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

①毛主席一九六四年五月的一次谈结。转引自一九七〇

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产阶级专政。它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是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从而，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已经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一种形式。合作制的性质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和一定的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列宁说：“毫无疑问，合作制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①苏联叛徒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苏联的集体农庄，已经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农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着篡党夺权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在经济领域胡作非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抛出一项项所谓惊人的“改革”措施，妄图投机取巧，出奇制胜。结果，给工农业造成很大混乱，使劳动人民大吃苦头。如在农业方面，一九五四年开始强行推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孤注一掷。虽然垦区头几年曾收获一定谷物，但是原有的许多农业区却由于投资相应减少，机器，肥料供应不上而大量歉收。而且在垦区也由于无水利建设，肥料不足，收成也很快大大下降。特别是，慢长的干旱，巨大的热风，被疏松的土层迎风而起，飞砂走石，暗无天日。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不得不作出决定，停止这一劳民伤财、冒险主义的“垦荒运动”，把许多生荒地改为牲畜饲养区。一九五五年，不管各地自然条件是否合适，在全国又开始掀起一个所谓种玉米运动”。结果，大部分土地上的玉米不是在灌浆时就做了青饲料，就是干脆让牲畜就地吃掉

①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5页。

了，损失十分严重。一九五八年，他们解散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把破旧的农业机器一律按高价卖给集体农庄，挖空了许多农庄的积累，有的还因此对国家欠下了巨债。在工业方面，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所谓“工业改革”，“权限下放”。他们任意撤消了部长会议所属的大多数专业部，把全国划分为一百零五个相对独立的经济行政区，实行分区管理，给全国的经济协调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造成了很大困难。连苏修的《苏共党史》也不得不承认，从此，“工业总产值的速度开始日趋下降”。

在对外政策上，赫鲁晓夫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打着“和平共处”的招牌，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所谓外交总路线。这一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勾结美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妄图称霸世界。但是，苏修既然要主宰世界，就不能不同美帝发生尖锐的矛盾，和美帝进行又勾结又争夺的激烈角逐。

苏共二十大后不久，爆发了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修乘机开始打入中东。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赫鲁晓夫扬言“苏联决心使用武力”，甚至说要使用“各种现代化毁灭性武器”。苏修的这种趁火打劫，图谋染指中东的行动，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对苏修提出警告，如果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予以反击”。苏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冲突，是它们争霸战的序幕，以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的“柏林危机”中，苏修和美帝就展开了激烈地搏斗。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西柏林①成为苏美争霸欧洲的焦点。美帝把西柏林看作与苏修争夺欧洲的“前线城市”，竭力把它装扮成所谓“自由世界的橱窗”，来挖苏联的墙角。苏修则把西柏林看作是对自己的“潜在的威胁”，企图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赫鲁晓夫宣布，他“决定动外科手术”，“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照会西方国家，“建议”缔结对德和约，结束西柏林占领制度，使之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否则，苏联将在六个月后单方面同东德缔结和约，美国唯恐失去它在西柏林的地位，拒绝了苏修的建议，表示要决心“留在柏林”，双方不断发出好战叫嚣，制造了一场国际危机，最后，赫鲁晓夫被迫放弃他那最后通牒式的六个月期限，“柏林危机”暂缓下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会谈时，又提出了结束对西柏林占领的问题，并限定在年底以前缔结和约。会后，赫鲁晓夫发动一连串的政治攻势，甚至发出大战的威胁。美帝再次拒绝了苏修的建议，表示为“保卫”西柏林，“准备使用武力”，扬言“如果战争开始，将是在莫斯科而不是柏林”，并宣布进行局部战争动员。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当争夺日趋白热化之际，赫鲁晓夫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九六一年十月，他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宣

① 柏林原是德国的首都。二次大战后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在两个德国正式分裂前夕，大柏林市也一分为二。东柏林成为东德的首都，西柏林仍保持西方三国占领状态。它处于东德领土范围之内，但不属于东德，在政治、经济上与西德关系，在行政管理上，则自成一体。